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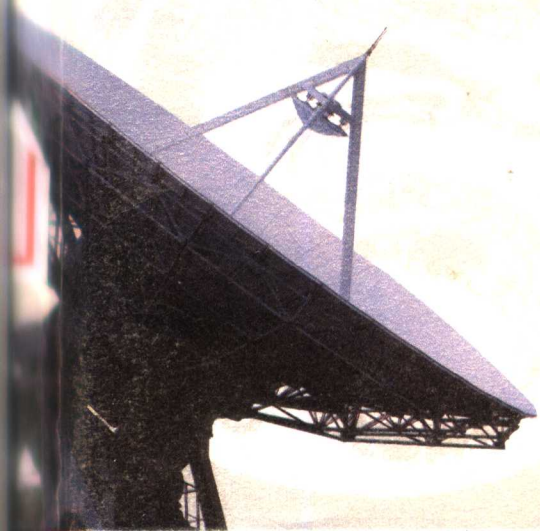
主编／金冠军 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

现当代卷

戴元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主编 金冠军 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

现当代卷

本卷著者 戴元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金冠军、戴元光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13-04004-0

I. 中... II. ①金... ②戴... III. 传播学—思想史—中国 IV. G20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084 号

中国传播思想史

金冠军 戴元光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 张天蔚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总印张:103 总字数:1943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50

ISBN7-313-04004-0/G·724 总定价(共 4 册):2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民初传播业和传播思想	1
第一节 民初传播的政治与文化生态	1
第二节 民初传播业的短暂繁荣	8
第三节 民初传播思想的学术积累	13
第四节 西方传播思想的传播及影响	22
第二章 现代先驱者的传播思想	37
第一节 传播自由学术思想的短暂高涨	37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与传播研究	40
第三节 蔡元培：“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	51
第四节 李大钊“使命”观和民彝主义	55
第五节 陈独秀：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家	63
第六节 邹韬奋：为了大众属于大众的传播观	70
第三章 五四时期传播思想的嬗变	80
第一节 西方传播思想的传入与中国传播观念的变化	80
第二节 五四运动与《新青年》	8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早期的传播	92
第四节 五四时期重要传媒和传播思想	100
第四章 现代传播思想研究的启蒙	108
第一节 徐宝璜：“供给知识”与“代表舆论”	109
第二节 邵飘萍：“品性为第一”	120
第三节 戈公振：“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	124
第四节 传播思想研究的分流	131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影响	134
第五章 自由传播理论与实践	154
第一节 自由传播与民办传媒	154
第二节 《申报》与史量才：“经济独立”、“言论中立”	159
第三节 《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164
第四节 范长江：“报纸是政治的工具”	168
第五节 储玉坤：“报纸是社会的灯塔”	172
第六章 毛泽东传播思想	181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	181
第二节 毛泽东传播思想的三个来源	185
第三节 毛泽东传播思想的理论内涵	188
第四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传播思想的继承	190
第七章 传播思想研究的曲折与艰难	196
第一节 新中国传播思想和传播政策	197
第二节 刘少奇的传播思想及对传播政策的影响	209
第三节 陆定一的人民报刊传播思想	212
第四节 政治运动中的传播思想	216
第五节 传播理论的困惑与传播业危机	220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对传播科学的扼杀	224
第七节 传播研究的转折	229
第八章 屡遭困厄的当代传播思想家	242
第一节 王中：传媒“是宣传工具”也是“商品”	244
第二节 徐铸成：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	249
第三节 储安平：报刊是“共同说话的地方”	256
第四节 甘惜分：传媒是社会舆论机关	260
第五节 方汉奇：传播者要有“学术良知”	262
第九章 当代西方传播学的传播	266
第一节 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	266

第二节 西方传播学的传播	276
第三节 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传播学的最初认知	281
第四节 传播学研究的深化	292
第五节 迅速发展的传播学应用研究	312
第六节 传播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326
第七节 传播观念的嬗变	356
第十章 传播学研究的转型	376
第一节 新媒体理论	376
第二节 传媒新经济思想	404
第三节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415
第四节 传播学的价值重构	438
后记	455
主要参考文献	457

第一章

民初传播业和传播思想

20 世纪以来是世界传播业飞速发展的世纪,也是中国传播业飞速发展的世纪。大众传播媒体从单一的报纸、杂志等发展到有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的质量今非昔比,传媒的高科技日新月异。技术改变了传播,传播改变了世界。但这个“改变”也是在充满忧患和艰难险阻中渡过的。

100 多年前,当人们揭开 20 世纪第一页的时候,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怀着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中国人尤其是如此。

100 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令人有点后怕却又不无骄傲与自豪的历史,并进入又一个百年时,中国传播学人的心情依然是错综复杂的。

第一节 民初传播的政治与文化生态

当我们讲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时候,人们不免会首先想到和讲到中国的远古文明以及悠久的华夏文化、万里长城、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但一旦谈起近现代,谈起 19 世纪、20 世纪,人们便摇头叹气,不无遗憾。

一、“维新”时期中国传播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中国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但 2000 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没有跳

出传统文化的框框。

从1840年起的一百多年,中国没有完成从传统文化向现代科学文化的过渡,虽然在这一段时间,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绅士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开始了在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外国传教士也在中国办学校,印刷报书刊,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妨害了中国人民接受西方文化的热情。

1895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专制的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使中国“国之不国”,清廷内保守派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反对研究西方政治与文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①可见,这时期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态是复杂多变且极不稳定的。

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的耻辱,在加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唤醒了许多中国人,清廷内较开明的君主在事实面前不得不采取某些明智的措施,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爆发了“百日维新”运动。维新变法失败了,中国人却被进一步唤醒。但是,外来文化与政治思想的传播,需要一定的人文与政治的背景,人民也需要认知的过程。在清末,清政府对内实行“文字狱”,对外闭关自守,社会没有活力。人民刚刚接受西方文化,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资产阶级民主制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外,^②“广大群众在观念上都还没有产生重大变化。所以在19世纪末,一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到处奔走呼吁,唇敝舌焦,号召变法,指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却提出了‘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的口号”。^③

1900年八国联军的人侵,动摇了清王朝的自尊与自信。1901年,为缓和国内外矛盾与冲突,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王朝不得不实行“新政”。“新政”虽是清王朝挽救没落统治、欺骗人民、取悦外国人的不得已之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民主的成长。

比较而言,1906年清王朝展开的“预备立宪”活动,对中国传播业的发展

①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卷47. 24页

② 陈炽. 庸书外篇卷下. 议院

③ 史金生. 中华民国文化史.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4页

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其标志是中国新闻法制建设的进步。1906年,清王朝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拟订和公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由于一时无法施行,巡警部京师巡警总厅于1906年10月12日颁布《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9月5日,民政部制定了《报馆暂行条规》10条,经清廷批准后,作为正式《报律》颁布前管制报纸出版业的法令,在全国施行。1908年3月14日,《大清报律》奉旨施行。1910年清廷民政部再次修订《大清报律》,经资政院复议后颁布。1911年1月29日,原《大清报律》改为《钦定报律》,并在全国施行。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代王朝,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文化上与经济上的衰败及残酷的“文字狱”昭示着清王朝的必然灭亡。但大清在覆灭前所颁布的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特别是《大清报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在封建统治的末年初步建成”。^① 这些法律包含了这样的一些思想:虽然国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被限制在法律范围内并且受皇帝的制约,但事实上承认了国民有传播信息的自由,有创办报刊的自由,这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是空前的;《大清报律》中关于出版自由的认知和报刊出版的管理制度吸收了西方的思想,主要是吸收了日本的思想,如将出版物批准制改为注册制加保证金制;在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在报刊上注明发行出版人、报送报刊样本、更正与禁载事项等。这些内容已经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的传播思想,虽然事实上是不可能实行的。

徐培汀教授认为,清末的新闻法制有三大特点:

(1) 资本主义的形式,封建主义的内容,即在形式上照搬西方,特别是日本的新闻纸法,含有十分浓厚的近代资本主义法制色彩,但其目的是为了钳制日益发展的新闻事业及宣传报道活动,维护清廷的封建统治。

(2) 无法取信于民,在实践上缺乏应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基础。

(3) 无权制裁在华外报。^② 黄瑚教授也认为,清末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与法令,无论从其制定与颁布的历史背景,还是从其内容来看,均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鲜明特点。^③

总之,清末的“新政”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维新”失败了,虽然唤醒了许多中国人。民初就大为不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打开了阻碍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壁垒。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① 史全生. 中华民国文化史.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7 页

② 徐培汀. 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③ 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国的口号,实际上只注重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忽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西方文化的传播只局限在学界范围。

二、民初的传播环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文化理念像潮水般涌进中国。辛亥革命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他一系列法律与条例,建立了以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原则的新闻与传播的法律制度。肯定了“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享有人身、居住、产业、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和信教之自由。”^①一时,各种报刊、通讯社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仅报刊就有 500 多家。不少报刊把监督政府、议论时政、反映民意作为主要任务,有些报刊甚至公开指责大总统。

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精神,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政治民主体制和思想不仅影响新体制的产生,还渗透到文化、经济、宗教、艺术、教育、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各种学术观点基本上都能自由讨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民国时代,“在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中……(又无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② 史全生在《中华民国文化史》中认为,辛亥革命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主自由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自从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作了初步介绍后,历经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严复等人的进一步传播,到辛亥革命时期,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并由思想上的宣传变成政治现实。二是科学精神(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 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只被少数人接受,直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自然科学体系。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认识到自然科学对于建设国家的重要性。陈独秀提出了“德先生(即英文 DEMOCRACY)”和“赛先生(即英文 SCIENCE)”,并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三是有振奋的民族精神。鸦片战争后,觉悟的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纷纷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方法,洋务派也

① 史全生. 中华民国文化史.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658 页

兴起“自强新政”，新兴的资产阶级相继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人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虽然“洋务派”的“自强维新”不过是为加强清朝的统治，但人民群众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当然，他们对外国列强的认识还比较感性和模糊，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也没有摆脱封建的范围。可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希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识已有很大的提高。

民国成立后，西方文化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民族文化得到较快发展。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清朝被推翻，中国人民处于极大的兴奋中。辛亥革命将专制君主从金銮殿上拉下来，政权却落入袁世凯之手。打倒一个封建王朝，却出现一个黑暗的民国。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政治制度的变化是革命的首要目标，但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变革却是根本性的，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关键，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于是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为革命已经胜利，旧的禁锢已经完全粉碎，从此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凡百事业都可以欣欣向荣了”。^①除少数革命党人在酝酿新的武装斗争外，大多数人已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中，传播西方文化成为热潮，“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报界更是利用舆论阵地评说时政，监督政府，宣传民主。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与效果不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袁世凯上台后，不待阵脚稳定，就开始向新文化进攻，发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戒严令》等，禁止人们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禁止报刊的出版，企图扑灭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封建文化的反扑激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文化领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反对文言文，批判旧伦理、旧道德，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新青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青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克思、列宁原著中译本先后问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三、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及其传播意义

辛亥革命打倒一个昏聩的王朝,却换来一个黑暗的民国。中国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中认识到,中国不仅要求政治制度层上的改革,还要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觉醒。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教育学家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思想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策源地。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期开始改为《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①《新青年》以尖锐、泼辣思想和自由、生动的文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巨大反响,也招致卫道士的仇视和围攻。”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绩是胡适等人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改良”。唐宋古文运动以来,“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原创。文学在形式上讲究韵律,应用俗词俚语,而明清的八股文章更将其推至极端。陈独秀在主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时,就主张“写实主义”,提倡写文章的“八不主义”: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讲求语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需有个所在。八曰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②

陈独秀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史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腐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③

在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在《新青年》的鼓动下,一批经过启蒙的新青年开始与新会复古崇古派决裂,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小说、诗歌、散文等。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1918年)、《阿Q正传》(1921年),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闻一多的《红烛》(1923年)、《死水》(1928年)等,开一代新风,为20世纪上半叶白话文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

1920年,民国教育部发布训会,要求小学废除文言教科书,以白话取代古

① 冯天琦、杨华. 中国文化发展轨迹.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 胡适. 致陈独秀信. 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③ 文学革命论

文,使白话文作为“国语”在全国普及。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实绩是汉语言文字的改革。从甲古文开始,汉字在中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但文字作为传播载体,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书写;数量极大,极难掌握,字型与拼音差距很大。汉字的复杂性使传播文化受到很大限制,被鲁迅称为“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钱玄同列举汉字种种“罪恶”,提出“打倒汉字”,主张要“废孔学,灭道教”,首先要“废记载孔门学广大及道教妖孽之汉字”^①

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和汉语言文字改革直接推动和促进了传播的发展,其中尤其是满足人民群众阅读白话报刊需要,推动传播事业与人民的结合。这一时期,《字林沪报》的副刊《消闲报》上发表的《释〈消闲报〉命名之义》说明了白话报刊的特点:“一篇入目,笑口即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为遣闷排愁之助也,此事为当道诸公消闲者也。”的确,白话报纸有的如游戏人生一般,“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但并非玩物丧志;有的是“嬉笑怒骂,做振聩发聋之笔”。^②当然,也有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芸芸游戏类小报,成为茶余饭后的玩物,“在世态不振的时代,也算是一种宣泄与度世”的需要。但大多数人还是对革命党人和革命报人甚至维新派创办的白话文报纸报以积极的理解,因为这类报刊“对于启蒙民智、开启风气有着积极意义,对于把传统的受古文束缚的报刊推向现代化大众报刊也功不可没。”^③以北京为例,《京话日报》是改良派人士彭翼仲于1904年创办的,在北京文言报刊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行过万。1909年,该报发表署名“瑞卿魏同春”的文章,赞扬白话文报纸,仅录两段:

论报馆好处

各报馆抡铁笔争赛文明
采新说求实事开化新风
结团体益民智补录要政
兴国势增学问智远无穷
报如同我国民前途大幸
广言路储才子通达下情
登贪官言污吏劝其修政

①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9).4期

② 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③ 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直言谏非是仇情理不同

在推行白话文和白话报纸的运动中,最有影响的要数《中国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创刊于1903年,虽只坚持了一年,影响却很大。主编林獬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对白话报的特点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

天气冷啊!你看西北风呜呜的响,挟着一大片黑云在那天空上飞来飞去,把太阳都遮住了。上了年纪的这时候皮袍子都上身了。躺在家里,把两扇门紧紧关住,喝喝酒,叉叉麻将,吃吃大烟,倒也十分自在。哎!倘使你们列位,都看见这几天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中间所载的什么“东省警闻”、“俄事要电”,知道奉天已经失守,旅顺口一带兵船几十只往来不断,日本、俄罗斯一旦开了仗,我们中国这么危险,想到此地只怕你远年花雕也喝不上口,清一色双台和也忘记碰下来,就是那清陈宿膏广州烟也吃得没有味道哩!

第二节 民初传播业的短暂繁荣

从中国第一张近代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到民国初的近100年时间,中国传播业已有长足的发展。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国近代传播事业进入现代的新阶段。

一、传播业的短暂繁荣

从报刊来说,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报刊活动的主角;报刊的党派角色更加浓厚,成为政党论争的工具,从而引发了革命派报刊与改良派报刊之间的大论战;随着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的开展,国内各种势力办的各种类型的报刊又重新活跃也起来,形成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①据不完全统计,民初,中国的报刊大约有500多种,销量在4000万份以上,但是全国的布局是不平衡的。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报刊“已逾百家”。^②上海、广州、天津等报刊较发达的地区已有较大的增加。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资料,其他各地区也迅速发展,诸如“武汉19种,成都、南昌各20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 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之演说词.1912.10.22

余种,杭州 16 种。连嘉定、金山、青浦、崇明、新会、梅县、高州等一些小县城,也出现了不少新办报纸。其中仅嘉定一个县,从 1911 年 11 月到 1913 年 2 月,一年多里,就新办报刊 10 种。”^①报刊的品种很多:政治报刊、经济报刊、教育报刊、学术报刊、文艺报刊、妇女报刊、学生报刊、儿童报刊等,报刊性质也不相同,有同人的、政党的、社团的。

曾虚白先生以为,虽民初报业有不少的数量,但不是繁荣。这是因为民初报业保持着清末时的特点。在内容方面,重视政论,轻视新闻,这是清末“文人论证”的传统,“决定于几支笔”,“报纸的命运,在少数几个文人手里”。在政治倾向方面,由于办报的开支很大,而报业能否支撑,关键是经济实力。因此报纸要坚持下去,必须依靠政党、政客及政治势力的支持。报纸靠政客的支持,自然难代表民意,难发挥报纸的社会功能,而结果只能沦为政治的工具。不错,中国报业(传播业)一直生活在政治的阴影下。而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政治腐败与政治畸形的双重结果。同时,中国虽有几万万同胞的读者基础,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最广大的受众生活在交通困难、生活困难的最广大的地区,他们没有阅读的能力,最大量的土地无法养活其主人,报纸只能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文化相对发达地区的少数人的奢侈品。这是中国的现实,是不能马上改变的中国现实。

二、传播立法取得历史性进步

民初报业为中国传播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中国传播业的民族性质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传播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达 2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具现代色彩的新文化在全国传播,传播自由的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张扬,推动了新闻传播立法。虽然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颁布了《戒严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但袁世凯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反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至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确立了现代的新闻传播体制,承认“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的权利^②。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列入国家的法律,通过立法的手段保障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1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 陈旭麓.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通电全国,“查满清行用之报律,军兴以来,未经民国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① 1912年3月11日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认为除非“增进公益,维持治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② 1912年3月17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通令开放堕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取消清朝对各类所谓“贱民”的歧视与限制,肯定“天赋人权,种属平等”。同日,孙中山应上海日报工会之请,命令交通部核减新闻部邮电费,以发展报业。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所创建的新闻体制是中国传播法的历史性进步,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觉悟,也是西方自由新闻体制取代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历史性实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不仅积极创建自由新闻体制,在实际政治运动中,业始终贯彻和遵守新闻自由体制。他指出:“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业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更重。”^③

1912年,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圆满解决了因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而引发的风波,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对自由新闻体制的积极态度。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等人鉴于《大清报律》废止后新闻出版业出现的法律真空的情况,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了《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提出:“(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阴历四月初一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员姓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发行,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中华民国暂行报律》发布后,立即遭遇新闻传播界的同声反对。3月6日,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实事新报》、《神州日报》、《民报》等几十

① 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49号,1912.3.27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各地,反对《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的颁行。著名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领袖人物、报人章太炎则发表文章对《中华民国暂行报律》逐条批驳,指责南京临时政府“欲蹈恶政府之覆辙”,是“钳制舆论”,提出“民主国本无报律”的观点,否定新闻传播立法的必要性。“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制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亡清诸史,自知政宏多,遭人指摘,施行报律,以为舆论之阶。”作为大总统的孙中山采取了明智的态度,于新闻传播界通电全国的当日就明确表态:“民国一切法律,须经参议院决议发布,乃生效力。此次内务部所布暂行报律三章,未经参议院决议发布,应作无效。”3月9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催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从孙中山否定《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的勇气看孙中山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和对言论自由的科学态度。

三、出版业的发展和曲折

辛亥革命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经过辛亥革命,先进思想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已在中国传播,学校里教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而出现多元的景象。从1911年开始,图书出版已进入较繁荣的时期和较高的层次。这时候的图书主要有四类:“一是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读物,以新型教科书和科学普及读物为代表;二是宣传革命思想,引导民众觉醒的马列主义著作和通俗读物;三是提高民众情操,丰富民众生活的各类文学艺术读物;四是继承文化遗产、积累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古籍读物及其有关的工具书。”^①尤其是起于清末的新式教科书的编辑有相当的成绩,内容既不是西方的翻版,也不是传统书籍的再版,而是全新的版本。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是靠出版新式教科书起家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陆费逵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组建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其后,又编辑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191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各种教育法和教科书编纂纲要,中华书

^① 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